

鄭成功傳

鄭成功傳

PDG

郑成功传

第一章

英雄的成長

第一節

英雄发跡 成功出世

(一)

明朝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七月十五日，日本肥前平户河内浦千里滨，忽然而阴霾四布，天昏地黑。不久，雨过天青，风和日暖，海面上浪平如镜，一阵又一阵的海鸥轻盈地低迴着，景色十分秀丽。

这时候，旅居日本的中國商人郑芝龙的妻子田川氏，正在海滨遊赏，检拾贝类。一会儿，她忽觉腹痛，好像要分娩似的。她来不及回家，就在一棵高大的青松下一块巨大的盘石上休息。不久，生下了一位婴儿。因为是在青松下诞的，父母亲就给他取了名字，叫做福松——这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郑成功诞生时，正是明朝政权日趋崩溃，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时代。

明朝自万历中叶以后，国势已经衰败不堪。东北境内，满洲族酋长努尔哈齐兼并了辽东大片土地，建立后金。万历四十六年，金兵攻陷抚顺，大败明师；天啟元年，又攻陷沈阳、辽阳；崇禎二年，金兵更分三路大举入侵，直逼大安口，虎视眈眈。东南沿海，荷兰（荷兰殖民者）继倭寇、葡萄牙海盗之后，于天啟二年侵占澎湖窥犯厦门，骚扰金门海面；三年进犯鼓浪屿；四年，即郑成功诞生的这一年占据台湾南部；天啟五年，西班牙强盗也跟着把台湾北部占去。

这是一个民族敌人南北进迫，民族危机四伏的国难之秋，而明朝统治阶级却在干着一系列令人发指的勾当！

明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整天躺在深宫里抽鸦片，二十多年不临朝听政。皇室贵族奢侈淫逸，贪婪无厌，朝“暮”“夕”“劳耳目之好，极声色之欲”。大小官僚，只知层层贪污，鱼肉人民，对战守之备却置诸不问。天啟年间，熹宗任用宦官，阉党头子魏忠贤操

纵軍政大权，排斥異己，殺害要求改良政治的東林党人；加强厂卫特务统治，广播爪牙，有所谓“五虎”，“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狗腿名号。这些坏蛋四出偵緝，横行霸道，民间偶而议论魏逆，就被殺头，甚至剥皮割舌，慘死的不可胜数，全国陷入黑暗恐怖之中。崇禎帝朱由检继位后，虽然铲除魏党，重新起用東林党人，但贵族大地主的基本势力仍然存在，宦官照旧入阁，派系斗争继续进行！政治还是不可能改善。宦官用度依旧非常惊人，单脂粉銀每年就要四十万两，宫女多至九千人，宦官增至万人，每月米粮七万二千石，每年鞋料費五万两。

这时，明朝政治上腐朽反动，生活上荒淫无度，国库空虚，財用日絀。统治者为了滿足本身的享乐和供应防备辽金以及镇压农民起义的軍餉，就对全国人民进行更公开更大規模的掠夺。首先是掠夺土地。官田迅速增加，民田急剧减少。如苏州地方，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吴中一带，人民有田的只占十分之一，而佃家却占十分之九。其次是加重田賦。万历四十六年开始的“辽餉加派”，崇禎十年开始的“剿餉加派”，十二年开始的“練餉加派”超过正賦几乎一倍。农民失去土地，賦税反而增加，造成“产去粮存”，“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歿死者之役”的慘痛后果。再次是巧立名目，搜括民脂民膏。尤其是派宦官充当矿監稅吏，到處勒索，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無粟皆空”；甚至掘墳墓，奸淫子女，致使人民飲恨，哭声載道，天下如同鼎沸，沒有一块安静的地方！

統治阶级腐敗到这地步，完全不管國計民生了，遂使天灾橫行，人禍无穷。从万历到崇禎的七十多年中，灾荒年头占了六十二年！特别是崇禎元年，陝西大旱，灾情空前严重，朝廷置之不顾，以致造成人吃人的惨象。当时延安府安塞县人马慤才为礼部行人，曾經上疏报告其家乡人民生活的慘况：“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則剥樹皮而食——迨年终而樹皮又尽矣，則又掘共山中石块而食，——不数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窟，每日必弃一二嬰兒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妻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死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穉顰及独行者，一出域外，便无踪迹；后見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而食人之人亦

不免，——于是死者枕籍，臭气薰天。”这简直是人间地狱了！
(註二)

人祸已极，天灾复加，人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只好卖妻子，卖自身，到處流离失所，“初为流民，继为‘流寇’，蔓延全国，不可收拾”。就这样，农民大起义爆发了。

天啟七年，陕西灾荒很严重，知县不但不救济，反而加派勒索租税，农民大批逃亡。白水县农民王二集合了几百个饥民起义。不久，各地饥民纷又响应，揭开了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

崇禎元年，王嘉胤在陕西府各县聚众数千人起义，以王自用、白玉柱为左、右丞相，张献忠为将军，队伍很快扩大到三万多人。

王二、王嘉胤的起义，正如火又无火，转眼间便成为燎原烈火。就在崇禎元年这一年当中，王大梁起义于汉南，高迎祥起义于安塞，王左桂起义于宜川。农民起义便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展开了。

崇禎八年正月，著名的农民起义队伍十三家、七十二营的大小首领，大会于荥阳，讨论如何打破官兵的围攻。高迎祥都督李自成提议说：“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死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剋期听之。”大家赞成他提的联兵作战，争取主动，“分兵定向”的积极作战计划，决定四路分兵，扩大战区。

这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把农民军各自为战的局势推向联合作战的阶段，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威力。但是，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没有推选出一位最高统帅来统一指挥，这是一个严重的缺失。因此，四路分兵，虽获得了辉煌的战果，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崇禎九年七月，高迎祥中伏被执，解京磔死。他的部下推李自成为闯王。以后起义军整尔力量，逐渐集中于李自成、张献忠二人，革命形势继续高涨，明廷摇摇欲坠了。

(二)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在这样的时势里发迹起来的。

郑芝龙幼名一官，求学时取名國桂，字飞黄（或作飞皇，飞虹）。他的父亲郑绍祖，字象庭，做过泉州府史，世居福建南安县杨子山下石井乡。

石井就是郑成功的故乡。乡的西面有白鹤山，山下有块大石

，石下有清甘的泉水。大石结成白鹤曲颈饮泉的形状。石片乡的名称就是从此得来的。

石井枕山面海，名胜古迹很多。有乡内十景，即双龟献瑞、五马朝汉、三台高枕、渴鹤饮泉、石精甘泉、烟楼晚翠、鳌头独占、玉印朝堂、鲤鱼吐珠、牛脊寿青；又有乡外七景，即杨山晚照、双阳华表、石顷朝宗、紫帽呈紫、碧沙环带、浯屿居口、群秀列襟。登上鳌头（即鳌石山巔），极目回望，东面有国头湾，东南有浯屿，大小巔，烟波浩淼，舟舶往来；南面一马沃野，青苗迎风，正如锦绣铺地；北面龙江、鸿水，碧波鳞鳞；隔江层峦耸翠，蜿蜒不绝。每逢秋月当空，马江水波不兴，吴淞灯，渔歌唱和，声色相渲，風景如昼。

郑始祖在这山明水秀的地方生了四个儿子，老大就是郑芝龙，老二叫芝虎，老三叫芝凤（后改名鸿逵），老四叫芝豹。

郑芝龙五岁在泉州入学。七岁时，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路上看见逆牆有荔枝，捡起石头就打，不意打中了泉州太守蔡善继的纱帽。善继派人把他抓去，本来想治罪，一見他样子生得满好，认为他“后当贵而封侯”，夸奖了一番，就把他释放了。

郑芝龙年青时，放荡不羁，不爱读书，但有臂力，好拳棒。天启三年，随商人李自到日本做買賣，住在肥前平户河内浦，娶了平户女子田川氏做妻子，这就是郑成功的母亲。

郑芝龙在日本不久，就结识了颜思齐。思齐字振泉，漳州海澄人，因受官府欺侮，棒拳打死官仆，逃往日本平户做裁缝，颇有积蓄，仗义疏财，结交了一大帮朋友。不久，颜思齐就和郑芝龙、杨天生等二十八人，从日本到台湾，在鹿港（今北港）安设寮寨，抚恤当地居民。思齐为首伶，分配所属耕种，建立了有效的社会管理制度。思齐常率伶船隻剽掠海上，漳、泉一带贫民，因受官府压榨，没有出路，多闻声归附。郑芝龙的弟芝虎、芝凤、芝豹，同族芝莞、芝燕、芝庭等，总共十八人，也前往参加。思齐声势更大，拥有部下三千多人，经常出没在闽、浙海上，明朝官府无奈他何。

天启五年，颜思齐病死，部下推郑芝龙为首伶，芝龙

更加用心經營台灣。一年後，他所統轄的地區，經濟，民政都已粗具規模；軍事設備也擴大了，在台灣人民中樹立一定的威望。

鄭芝龍有了這樣一個基礎以後，就想進一步向外發展了。天啟六年二月，他帶伶戰船，快哨，從台灣出發，三月攻金、厦，四月打粵東。這時，明朝沿海守將，都是承蔭襲、寬衣大袖的官僚，只知坐享俸祿，那里懂得打戰；他們的部下兵士，也是立操吳卯而已，缺乏戰鬥力；又碰到濱海地區旱災，財主屯積居奇，米价騰貴，飢民多逃亡從芝龍。因此，鄭芝龍軍勢更大，所向無敵。

泉州太守蔡善繼對鄭芝龍有過拋石不責之恩，明廷就命令他負責招撫。蔡善繼遣黃昌奇帶諭杜招。鄭芝龍自謂“海上弄兵，反非本意”，又感激蔡善繼的恩德，便帶隊跟黃昌奇到泉州歸順。巡撫朱欽弟命令蔡善繼繳獲芝龍船隻、武器，另候安插。鄭芝龍說：“此欲散我黨羽耳！”鄭芝龍看到明朝不給他官做，又覺得芝龍的話有道理，又揚帆走了。

鄭芝龍離開泉州，再攻粵東，又回閩打銅山，大敗都司洪先春，但不追趕。逃虜盧毓英輕視芝龍，合力“進剿”，想不到卻被打得落花流水，並且做了俘虜。芝龍也不害他，而且以禮相待，放他回去，同時對他說：“朝廷苟一爵相加，則東南半壁，可以高枕無憂矣！”

盧毓英退回厦門，見了都督俞咨皋，報告敗敗經過和芝龍想就撫的意思。但俞咨皋不同意招撫，又命令馬勝、楊世爵、陳希范等先後“進剿”，不料都吃了敗仗。最後俞咨皋大調兵船，親自出馬，又被打敗，棄甲而逃。

這時工部給事中顏健祖上疏劾俞咨皋罪狀。疏中說：“鄭芝龍生長在泉州……域社之鼠狐，甘為狐牙；辟具之胥役，盡屬腹心；紳偶有拳陳，事未行而機先泄；官府才一告示，甲造謗而乙訛言……故官不忧盜而忧民，民不畏官而畏賊，賊不任盜而任德。一人作賊，一家自喜死恣；一姓从賊，一方可保无虞，……杀人可以不死，家享巨室良田之乐，而身被豢養鏹金之貴。人皆有所利而為賊，何所懲而不為賊乎！”這就是當時政治腐敗所造成的情況，也是鄭芝龍得以縱橫海上的客觀原因。

而武將的情況又如何呢？該疏又說：“付將陳希范，嗜酒有癖，占風无智，泊舟銅陵之內港，派連坏酌，哨探報惊，屈被鞭

答：賊已迫，而纔未解。”身為都督的俞咨皋，則“範簡書如弁髦，視桑梓如秦越。而寅招撫之議，實傾賊軍以充私橐，敢于孟浪主張……粵艘不通，粵荒米貴，小民枵腹，莫必其命。而咨皋反委官駕船買谷，名為給食於兵，而實則鬻糧於盜，漳民爭飲商其肉而寢其皮。”遇上這樣糟糕的“將軍”，鄭芝龍當然可以所向無敵了。（註三）

崇禎元年，明廷因為對付不了鄭芝龍，只好再叫盧凱英前往招安。這一次鄭芝龍真的歸順了。明朝就委任他為海防遊擊，命他平海盜，許以立功時，再給他陞官晉祿。鄭芝龍很高興，就率領水師，馳聘海上，先後密敗李魁奇、楊六、楊七、褚練老、劉香等，併其眾。明朝把他升為付千戶。這時是崇禎二年。崇禎十二年，荷夷侵犯閩浙，也被鄭芝龍打得大敗。

鄭芝龍早在經營台灣時，就大做生意。歸附明朝後，進一步壟斷海上貿易。兩船不得到鄭氏的令旗，不能往來。每隻商船按例每年要繳交三千兩稅銀給鄭芝龍。芝龍的收入，“歲以千萬計”。由是，芝龍“富甲侯王”，大置田園，在安平（今安海）造築宮室樓台，栽植奇花異木；茅宅宏麗，錦厦既里，海船可以直接通入堂內。有一次，巡撫沈犹龙給母親做生日，鄭芝龍獻上珊瑚一株，高達二尺余，用金盒裝着，上面盤着一條珠玉做成的龙。巡撫看了，以賡不已，芝龍又再獻上一株。鄭芝龍奢侈纵乐，討好當道的情況，可見一斑。

本节拟插：(1) 日本肥前平户千里滨全景照片。

(2) 儿爺石照片。

(3) 石井台照片。

第二節

归國求学 经文緯武

(一)

崇禎三年，留在日本的福松，已經七步，長得儀容俊偉，举止异人。他看見別的孩子都有父亲在身边，自己的父亲却不在，心里又羡慕又难过。每当各國商船进入千里滨港口，他就拉着母亲，一起到海港眺望。他一看到中國商船，就问母亲，父亲在中國什么地方。他一问，母亲就哭，后来也就不敢再问了。

鄭芝龍宦途得意，在安平造立了显赫東南的宮室之后，就想

把妻子接回来。他向日本國王提出要求，几经交涉，才允許福松归國，但不让田氏走，说是按日本國例，日本婦女跟外國人結婚，不得跟隨丈夫回國。

这一年十月，福松跟母亲依依惜别之后，就从日本回到了祖國，住在安平家里。

福松看到家里房子一大片，既堂皇又富丽，还看到安平港口很多兵船都是他父亲管的。好多人侍候他，都叫他公子。他開始生活在一个豪富的家庭里了。

他回國以后，起初不大懂得祖國的語言和風俗習慣，又一直想念着他的母亲，有时还在背地里哭着。他几位叔父常为这些事故意取笑他，使他覺得很为难。只有他的三叔郑鴻逵看他很聰明，言_言語_語止不庸俗，往_往又抚摸着他的头对人说：“这孩子是我家的千里驹呀！”老前輩王觀光也对郑芝龙說：“你儿子将来一定成为英雄人物，不是你能比得上的。”一位相士观察了福松的相貌后，对郑芝龙称賀說：“令郎骨格仪容不同常人，正是濟世英雄，有王侯身分，不止是科甲中人物。”郑芝龙答說：“我是一个武夫，这孩子将来假如能在科举中取了功名，博得一官半职，显祖荣宗，就很好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郑芝龙很快请了一位老师来教儿子读书，並给他另外取了个名字，叫做“森”。

郑森开始当学生以后，明朝的國事一天比一天糟糕了。朝廷内部，上下互相猜忌，闹得烏烟瘴气。崇禎不信任臣僚，不断更換內閣大臣和边关將吏。天灾到处泛滥，賦稅急剧增加，老百姓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起义的队伍发展很快，声势壮大，明廷集中力量对农民軍进行残酷的鎮压，清兵乘隙而入。崇禎九年侵入北京近郊，俘擄人口十八万，京師戒严。边疆大将紛_紛又叛变，投降。

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交織在一起，全國到处战火紛飞，血腥遍野。

这是一个烽火連天的長_長峻的时代，郑森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度过他的学生生活的。

他求學很认真，既学文，又习武。他喜欢看孔子作的《春秋》，又爱研究《孙吳兵法》。读书之外，他还常_常又练习舞劍，射箭，跑馬，鍛鍊武艺；有空就到港口兵船上玩，在碧波盪漾、軍旗迎风飄揚之中听水兵们讲海上生活和战斗的故事。这些慢_慢地培养了他坚强、勇敢、豪迈的性格。

有一天郑森的老师以“小学洒扫应对”为题目，要他做文章。他动起笔来，一下子就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结束部分写道：“汤武之征伐，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应对也。”意思是说，做人应该象汤武尧舜一样，眼光要远，胸怀要广，要以澄清天下，关怀国家大事为己任。可见这时候他已经初步立下雄心大志了。

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进步很快，十五岁时就中了秀才。当他二十一岁时，正是崇祯十七年。这一年，国家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伶农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自缢；四月，汉奸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进攻李自成军队，五月占领了北京。明帝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

明朝政权的覆灭，是多年以来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崇祯十七年中，所用文武大臣数百人，“不误国者盖无几”，间或有一二心想尽忠为国的，又为门户排挤，不能有所作为。崇祯帝在煤山自缢前说，他希望有忠义之士，代他“将文官尽戮，武将全诛”。这样的政权就必然要被人民推翻的。

崇祯自死后两个月，弘光帝在南京即位，派陈璘带诏书到安平，封郑芝龙为南安伯，提升他为福建总兵，还调他的水师六千人到南京防守。郑芝龙全家高兴，而郑森却更关心国家大事，不知道弘光朝廷是否能挑得起中兴的担子。

不久，郑芝龙派郑鸿逵、郑彩带水师北上入都，同时叫郑森跟着到南京国子监唸书，希望他将来加冠晋禄，光耀门庭。而郑森却怀着另一种心情——急于到南京看看天下大势，所以就乘此机会跟郑鸿逵一起北上了。

(二)

郑森初到南京，弘光朝刚建立，一时还没有出大乱子，他就抓紧时间，想办法深造。他听说礼部尚书钱謙益学问不错，就拜他为老师。钱謙益替他取了名字，叫做“大木”，希望他将来能成为国家栋梁。他写过两篇诗给钱謙益看一篇题为“春三月至虞谒牧斋师（謙益号牧斋）同孙爱世兄进剑门”，另一篇叫做“越旬日复同孙爱兄进泖河”。钱謙益的评语是：“声调清越，不染俗氛。少年得此，识天才也。”弘光朝廷的大臣瞿式耜也说：“挑泥上首，曲折马来，如入昼图，一结尤清绝。大首瞻瞩极高，他日必为伟器，可谓吾师得人

庚。”其实从詩中固可以看出郑森在詩文上的成績，但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出他对祖國錦繡山河的热爱，他所透露出来的宽广的胸怀，豪迈的性格，以及这大的認識。这时候他还受到儒家尊王攘夷、忠君愛国的思想影响。他想赶紧积蓄才学，好为国尽忠，帮助中兴。

但是，弘光小朝廷却很快地给他带来了失望。

福王即位初，形势尚有可为。清兵在关内所占不过直隸、山东等地，太行以西，黄河以南广大领土仍然非其所有。福王政权还有不少軍隊：江北有黄得功等四镇兵馬，江南有郑芝龙的闽軍，武汉有左良玉的三十六营兵，江西有袁应威的赣軍，湖南有何騰蛟的湘軍，还有两广、滇黔的地方軍，可用的兵力当在百万以上。同时，李自成退保山陝，張献忠据有四川，继续给清兵以极大的威脅。以经济而论，淮朔、江南的殷富，闽浙的鱼盐，两广的稻米，用以供应軍需，不成问题。而且抵抗清兵又是正义战争，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如果福王政权能发奋图强，放棄鎮压农民軍政策，集中力量对付清朝，则收复失地，再次中兴，并非不可能的事。

然而福王小朝廷却不可能这样干。它象曇花一現，不久也就覆灭了。

原来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等七大毛病，東林党史可法等认为不可立，而閹党馬士英以武力作后盾，硬把他拥立起来，史可法等被迫承认。馬士英又引用阮大铖等閹党余孽，把持朝政，排擠史可法到江北督师。《青燐屑》说当时有人在司馬門写道：“閹賊无門，（馬）正馬橫行天下；尤凶有耳，（阮）一人濁乱中死。”他们勾引福王齋化墮落，整天只顾敲锣百姓，享乐，斗蟋蟀，喝美酒，选淑女，盖宫殿，大肆夫妻閨歡。福王常住的宫殿有一付对联，说：“万事何如杯在手，百年几見日当头。”《南明野史》说：“当日幅员小矣，而官愈大；辟县少矣，而官愈多；財賦贫矣，而官愈富。”又说：“蔡国子弟，教坊乐人，出入殿陛，諸大臣呼为老神仙。”那时候有首民谣说：“都督多似狗，取方滿街走，相公只聽錢，皇帝但吃酒。”又有一首说：“中书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取方賊如狗，病起千年坐，拔貢一呈首。相尽江南錢，填塞馬（士英）家口。”《南明野史》說有人在馬士英的門板上寫

道：“两朝丞相，此马彼牛，同为畜道；二尧元魁，出刘入院，生是仙宗。”可见当时政权内部腐败到何等地步了。

这帮傢伙在腐化堕落的同时，对内迫害，屠杀爱国官吏，对外则贪生怕死，拥重兵而不战，主张妥协求降。他们派人带大量金银，绸绢，酬谢清廷，答应割地，乞求和平；对吴三桂的夫国表示祝贺，并封他为蒞国公，而对史可法的抗清则多方非议和破坏。可法打胜仗，向福王报喜，马士英说他在撒谎，不过是为了岁暮邀功，要钱，要粮。可法很形势吃紧，请求朝廷支援，马士英却置若罔闻，照旧跟门下一个和尚谈禅。斗蟋蟀，人号为“蟋蟀相公”。

马、阮辈不想抗清，而对攻打农民军却很积极。他们死先命令左良玉拥七、八十万重兵驻武汉，准备继续^剿农民军。而当左良玉因争权夺利，以声讨马阮为名进师南京时，马士英认为北兵至，还可议款投降，假如左良玉打进来就完蛋了，主张“宁死北，毋死左”。于是把黄得功，刘良佐的大兵调回来对付左军。结果江北防务尽撤，清兵乘虚而入，一日前进五十里，还看不见南明军队的踪影。

清兵长驱直下，四月十七日包围扬州，史可法坚守孤城，二十五日城破，可法被执，壮烈殉国。清兵占领扬州后，沿江南下，防江大将不战而逃。镇江总兵郑鸿逵，郑彩，只知用大砲轰击难民的船，捕杀从江北溃退下来的自己的逃兵，冒称为清兵，上表告捷，福王还晋封他为靖虏伯。而当清兵进逼镇江时，他们又马上带伶水师逃往福建。镇江沦陷后，清兵进逼南京，南明二、三十万官军，纷纷投降。五月十六日，清兵进入南京，福王逃走，又被俘去斩首。大官僚或逃或降，钱谦益也投敌当汉奸，一民族气节都没有。相俾有个乞丐，还投水而死，并作一首绝命诗：“三百年未养士朝，如何文武皆尽逃，纲常尚在卑田院，乞丐羞将命一条。”讽刺得多么痛快！

在南京求学的郑森，亲眼看见弘光朝的腐败情形，看见马、阮这一帮坏蛋如何断送江山，看见连他叔父郑鸿逵在内的武官如何贪生怕死，看见连他拜为老师的钱谦益在内的大官僚如何无耻地叛变投降。他感到非常愤恨。后来他认为这个政权复灭的原因是“君实非劫乱之君，臣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欲恨，天堑难遏也”。可见他从这件惨痛的亡国事件得到了多么深刻的教

育。他对钱谦益所谈的那一套儒家的道理开始怀疑了，今后到底该如何抗清卫国，如何中兴，他不得不独立思考了。

(三)

但是在南京的郑森也听到了许多抗清的英雄事迹。

在乌，阮通敌卖国，清兵大举南下的同时，爱国将领和各地义师却没有低头。他们坚决抵抗，爱尽最后一滴血。

史可法被乌，阮排挤到江北督师后，即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用心整编队伍，开垦屯荒，设立礼贤馆，招募愿意参加抗清的爱国人士。他日夜操劳，跟部下同甘共苦。清兵围困扬州后，史可法孤军抗敌，毫不动摇。清军统帅豫王多铎好多次写信招降，可法或乌来使，或投其信于水，或焚之。城破，拔刀自刎，血满衣襟，未绝，碰到清兵，大呼道：“我史阁部也”。他被清兵抓住后，多铎对他说：“前书再三拜请，不蒙报答，今忠义既成，先生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指重任。”可法答说：“吾为天朝重臣，岂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註四）

多铎还不死心，进一步诱惑说：“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可法断然回答：“我岂肯效其可为！”多铎计穷，就露出了刽子手的面目说：“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名。”可法慷慨地回答道：“城亡与亡，吾志已决，既劳死万段，甘之如飴，但扬州百万生灵，不可杀戮。”于是壮烈牺牲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眷怀着祖国、人民，这是多么伟大的崇高的精神呀！（註五）

史可法的精神、言行，对郑森的感染很深。他特别钦佩史可法那种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觉得史可法有血性，有志气，值得学习。他不但从史可法身上学到了如何坚定民族立场，而且后来还做效史可法的某些措施，如设立礼贤馆。

史可法英勇就义以后，他的精神却永存人心，继续鼓舞着人民的斗争意志。

扬州城陷，史可法被执后，他的部下刘肇基等继续率领义军士，团结全城人民，与清兵鏖战，直到人尽矢绝，清军才占领城池。

江阴人民起义，坚守城中，粮食将尽，士气却越发激昂。中

秋夜，皓月当空，江水茫茫，战士们屹立城垣，高唱战歌：“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

嘉定人民在城楼上高悬着“嘉定抗剿义师”的大旗。迎风飘扬，气象非常雄壮。他们对清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前后三次，不屈不挠，壮怀激烈。

一吴江进士吴日生，聚兵起义，痛击清军，被执后，从容就义，临刑时高呼：“今日微臣的责任其完毕了！”他的部下吕直忠，被捕后，对清朝骂不绝口，在刑场上大喊：“今天是大明义士报国的日子，大家都来看呀！”就义时只有十六岁，充分地表现了少年英雄的爱國精神。（註六）

这许多为了保卫国家，抗禦侵略者，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惊天动地的英雄好汉，不但深深地感动了年青的郑森，而且使他意识到依恃人民力量的重要性。他后来关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的主张正是植根于此的。

(四)

清军南下，到處搶掠，又下判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命令判发匠挑着杈子巡游街市，強制判发。蓄髮是汉族人的标帜，判发无异灭族，不能不激起汉族人民的反抗。特别残酷的是，他们为了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大肆屠杀，造成人间地狱。扬州沦陷后，清军下令屠杀十天，然后封刀，被杀害的共约八十万人。他们进入南京以后，就把南京变成“残军留瘦马，瘦马卧空槽——直入宫门一路蒿”（註七）三次攻占嘉定，就进行三次大屠杀，“骨肉狼籍，弥望皆是”。侵入江阴后，下令“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大屠三天，死亡殆尽，虎口余生的只有五十三人。就这样，原来江南一片繁盛富庶的锦绣山河，在清军野蛮的屠刀血洗之下，大都变成废墟了。

这些血腥的暴行，郑森听得很多，他深感到民族压迫的灾难的深重，他开始仇恨清朝了，而且这仇恨一天比一天加深。据说他后来连一个“清”字也不喜欢听，不喜欢说，不喜欢看。人家请他喝“清茶”，他听到“清”字，总喝不下。他在故乡石井一带，看见家家户户在清明节上山扫墓，这一天耳朵所听到的都是“清明”，他很感不快；特别是“清”字在“明”字之上，他更加懊恼。因此，他叫乡亲们不要在“清明”节扫墓，而移到“上巳

节”。至今石井一带的风俗习惯还是如此。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野蛮的清朝真是恨入骨髓了，而这仇恨的种子却早就在南京求学这个时候种下了。

本节拟插：(1)泉州安海屋塔乡照比。

(2)南京国子监照比。

(3)郑成功早期诗两首。

第三節

隆武賜姓 許身衛國

(一)

当郑鸿逵、郑彩逃往福建，途经杭州时，刚好碰到唐王。唐王就是明太祖第九世孙朱聿键。崇禎九年，清軍侵入北京近郊时，他没有接到朝廷命令就起兵勤王，祇是违法，被废平民，禁锢在胤阳“高墙”（即监狱）。弘光即位，大赦，唐王才出狱，奉命移住广西平乐。他走到杭州时，郑鸿逵遇見了，认为“奇货可居”，马上跟郑芝龙商议，把他带到福建，准备拥立他为皇帝，作为政治本钱。

1645年闰六月二十七日，郑芝龙，黄道周，张肯堂等拥唐王即帝位于福州南郊。郑芝龙全付戎装，骑马行在驾前，郑鸿逵率伶禁軍殿其后。唐王称帝后，建元隆武，改福建为福京，改福州为天兴府；封郑鸿逵为定虏侯，郑芝龙为平虏侯，黄道周为史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肯堂为左都御史。其他文武諸臣也分别得到晋封。

隆武政权建立时，李自戡已败死；清軍已侵占山陝，入据武汉，进逼湖南；江南甯庶地区先后淪陷。但是，抗清的有利条件还是有的：各地义师继续据城抗清，并纷纷响应隆武帝号召，愿意归附；李自成农民軍余部，看到明难复重，也愿意与南明政权合作，共同坚持抗清的斗争。光复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但是，由于主观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隆武政权终于还是走向毁灭的道路。

首先是隆武政权内部的腐败和分裂。隆武即位的初期，虽想振作，也采取了一些志在中兴的措施，如设立儲賢館，安民

心，制定抗清策略，准备御驾亲征等。但他顾虑多端，前怕龙，后怕虎，优柔寡断，“有爱民之心，而未见有爱民之政；有所言之明，而未收听之效；喜怒轻发，号令屡改。”（註八）他可贵的措施大多被成为帝上谈兵，无济于事。

这个政权的分子非常复杂，地方军阀依恃实力，倒行逆施，无恶不作；许多正直人士或被排斥，或仅有空名而没有实权。其中以郑芝龙的跋扈专横，最为突出。

郑芝龙拥重兵，以开国功臣自居，一身兼任兵部、户部、工部三部尚书，根本不把隆武帝君臣看在眼里。朝廷举行郊天大典，他和郑鸿逵托病不参加；他没有隆武帝的正式命令，潜用“监国庙后”的封号。

郑芝龙毫不讲理，争夺朝班次序。一天，隆武帝召集文武百官入朝议论战守策略，郑芝龙硬要站在东班首位。吏部尚书何楷词严义正地指责说：“文臣站在东班，武臣站在西班，这是太祖规定下来的制度。现在郑芝龙自高自大，抢着占据东班，这不但是对我们同僚的欺侮，而且实在是目无陛下，太野蛮了！”

郑芝龙在隆武帝和满朝文武面前，不但不接受何楷的指责，反而强硬地狡辩道：“文臣站在东班，武臣站在西班，这虽然是古来规定的制度，但是太祖已经加以改变，武臣徐达早就站在东班首位了！”

这时候，黄道周也忍不住了，站起来驳斥说：“徐达是开国功臣，你敢跟他比吗？”

郑芝龙恬不知耻，自我标扬地说：“以今天的形势看来，假如我从福建统率大军，恢复中原，一直打到北京，功劳也不在徐达之下！”

何楷不客气地顶他一句说：“帝上谈兵没有用，等你真正地打到北京，那时再站在东班首位，现在还早呢！”

几个人在殿上争来争去，隆武帝明知郑芝龙不对，也无可奈何，只有当和事老，劝解一番而已。（註九）

争吵结果，郑芝龙在“天经地义”的祖制的压力下，不得不暂时让步，勉强站在黄道周后头，可是心中老不火痛快。从此，文武更加不和睦，互相勾心斗角，离心离德，很难共事了。

郑芝龙对同僚非常傲慢，人家去拜访他，他“坐见九卿，入不揖，出亦送”，目空一切，简直像太上皇一样。

隆武帝时的郑芝龙

行籍因为参奏过郑芝龙和郑鸿逵不参加郊天大礼，又在朝班中跟郑芝龙争吵过，怕被报复，蹙又自危，主动辞职回乡，隆武帝了解他的“苦衷”，不得已批准。他走在半路上，突然间被人抓住，把耳朵割掉。据说，这件事就是郑芝龙暗中叫他的部下干的！

郑芝龙又藉口军餉不够，大肆搜括财物。他预征田赋，在春秋两税内，每石米预借银一两，并命令各府县将库存完全解送福州，以饱私中。他命令抚按以下，捐俸助餉，“官助”以外，又有“绅助”，“大户助”。他标榜出类官爵，“部司道三百两，余百两；武职数十两至数百两。坐死俸无署，仅空衔而已”（註十）。买官的人都是土豪劣绅和地主流氓，他们不但要捞回本钱，而且要藉此发国难财，于是更加横行乡里，敲榨百姓，以致全省怨声载道，严重地削弱了抗清力量。郑芝龙却利用所括财货，增置盖因五百余所，田因遍闽粤；而对隆武帝又一再说军餉不够。

郑芝龙身为大将军，拥有二三十万庞大的军队，但却不想率师北伐，甚至多方破坏抗战。清兵进入江西后，赣州人民群起抗清，隆武帝派郑彩和张家玉驰援。郑芝龙坐山观虎斗，不发兵支持，以致广信、吉安等城得而复失，使有利的局势转为危殆。黄道周认为当时形势，“战也亡，不战也亡；与其坐而待，不如出关迎敌”。他自请出征，要求发兵，餉。郑芝龙不答应。商量好几次，才拨给他一千名老兵残卒和一个月的粮餉。隆武帝无可奈何，只好给他数百张空札，教他自己去招募。福建人民七八千人主动参加黄道周队伍，没有武器，就用扁担、木棍，叫做“扁担兵”。黄道周夫人蔡石润是个巾帼英雄，也组织“夫人军”，担任后勤工作。这支队伍，手无寸铁，又未经训练，战斗力不强，终于战败。道周被执，慷慨就义。死前用血在衣服上面写着：“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其次，隆武政权又跟浙东的鲁王政权闹对立，不能合作。隆武帝即位后，派人到鲁王那边颁布诏书，鲁王拒绝接受命令，不用隆武年号，两个政权就开始分裂。后来由于张煌言的努力，虽然有些好转，但因为双方统治者的争权夺利，终是明争暗斗。隆武帝派人送十万两银犒劳浙东军队，全被劫夺；鲁王派都督陈谦入闽答礼，对隆武帝称皇叔父，不称陛下，隆武帝大怒，把陈谦关在牢狱里，过几天又把他杀掉。因此，两个政权的关系最后还

黄道周夫人

隆武政权

是彻底破裂了，互相抵消了抗清的力量。

再次，隆武政权对农民军仍然采取仇视的态度。当时张献忠几十万农民军还据有四川，假使隆武帝放弃镇压政策，争取这一支农民军的合作，不但可以把大批屠杀农民军的兵力用来抵抗清兵，而且可以使这支农民军北向山陕，牵掣敌人南进。但是隆武帝却下令“督剿川寇”，清兵乘机由陕西进入四川。张献忠北上遁敌，南明军队却在后面追害他。他前后受敌，终于败死。南明政权不仅丧失了一支本来可以合作的抗清力量，而且致使清兵很快占有四川，壮大势力，为进一步扩大侵略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随着形势的发展，隆武帝与郑芝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隆武帝急于北伐，好几次催促郑芝龙发兵。郑芝龙却推三托四，口是心非。隆武帝实在忍无可忍了，就稍加责备，郑芝龙马上免冠顿首，要死罪说：“臣武夫，赋性戆直，不能逢迎。今既见疑陛下，安敢负此重担，恃恩角中私第，以终圣世。”隆武帝无可奈何，只得和颜悦色劝慰他说：“朕之大事，悉以委卿，岂疑卿乎？但人有言，不得不为卿道耳。”又把他挽留下来。（註十一）

当隆武帝把陈谦关在牢狱中，并打算把他干掉的时候，郑芝龙请求释放，隆武帝不肯。后来弘光时派陈谦到福建晋封郑芝龙，诏令上写的官名是“南安伯”，书券里头误写为“安南伯”，陈谦对郑芝龙说：“安南则兼两广，南安仅一邑耳，该当券而另诏，更进伯为侯。”郑芝龙大喜，认为陈谦很够朋友。这时陈谦遇难，他想尽力援救。监察御史陈邦芑密奏隆武帝说：“陈谦为鲁王心腹，且与郑至交，不急除，恐有内变。”有人走告郑芝龙，郑芝龙说：“刑人于市，必经吾门，吾且命停刑，愿以吾官赎谦死。”（註十二）想不到隆武帝听陈邦芑的话，三更半夜下密令，就在牢中把陈谦杀掉了。郑芝龙知道以后，伏尸大哭，非常悲哀，以千金百布葬谦，为文以祭，有“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话。从此，郑芝龙对隆武帝更加不满了。

郑芝龙想进一步深入地控制隆武帝，隆武帝不满意他的跋扈行为，但又摆脱不了，还想依赖他。就在他们这种矛盾对立的情势